

者更了解近代中國的避暑旅遊發展，也為學者提出多個較新的角度進行有關旅遊史的學術研究。此外，因參考文獻的附錄與文中註腳相當清晰，內容亦易於理解，本書可作為初接觸旅遊史的學生的一個理想入門讀物。美中不足之處，是作者偏向利用中文譯本說明有關西方避暑度假發展的背景，如作者能直接閱讀及引用英文原著，將可避免少部分譯本與原著內容有所出入的問題。

楊堡棋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田中實加，《灣生回家》，臺北：遠流出版書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304頁。

「灣生」是指1895年至1946年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這是一個在臺灣和日本課本裡皆沒有記載的詞彙，是當時日本人用來輕蔑這一群在臺灣出生的日本小孩的專有名詞（頁26）。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清廷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日本政府為了把臺灣建設成另一個日本，舉辦多次官營與私營的移民。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交回給中國。1945年10月，由原臺灣總督府官員所組成的日僑管理委員，與臺灣省長官公署協議遣返日僑（日文稱為「引揚」）。在臺灣的日本移民與灣生須於兩個月內全部遣返，所有動產與不動產被沒收，發給收據，以備日後回臺灣領回。另外每人發給被單一張，冬夏衣服各一套，以及1,000日圓。1946年2月執行第一次遣返，被遣返的主要是日本移民與灣生。及後在1946年4月至1948年12月分別再次執行四次遣返，這時期主要是遣返「留用者」和「殘餘日僑」，前者是指具有各種技能和知識的專業人才，他們在1946年2月的遣返行動中被容許留下來；後者則是指躲藏不願離開者和以結婚為理由而留在臺灣的日本女人。1957年執行最後一次的遣返（頁69-74）。據日本的統計，自臺灣遣返者共有47萬餘人，當中一般國民有32萬餘人（頁13）。被遣返的灣生被安置於日本的偏遠山區，而且還要面對同胞冷淡的目光及差別的待遇（頁114）。

作者田中實加撰寫這書源於一次偶然的個人經歷。2001年，作者的奶奶田中櫻代去世；翌年，奶奶的管家竹下健志也辭世，他的妻子竹下朋子叮囑作者，待她過世後，要把竹下健志、田中櫻代和她三人的骨灰一起灑在摯愛

的臺灣花蓮港。2003年，作者啟程前往極度陌生的花蓮，追尋三人的身世，完成三人的遺願，自次開始此書的故事。

本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及第三部分是「老照片說故事」，第二部分「二十二個灣生的追尋」，述說了22位灣生的故事。第一部分的老照片說故事通過照片和簡單解說，以順時序方式展示吉野村——臺灣日治時期第一個官營的日本移民村——由開始墾殖到1946年吉野村村民被遣返之間的種種經歷。第三部分的老照片說故事則以照片和說明呈現吉野村留下來的各種建設，包括紀念碑、建築物和土產，以及日治時期花蓮港的建設。第二部分「二十二個灣生的追尋」是此書的主要部份，由田中實加所採訪的22位灣生的故事組成，每段故事皆使人撕心裂肺、感動流淚。美紀奶奶在被遣返前夕被父母許配給臺灣男子，以逃避遣返。為了不讓別人聽出她的口音，她從此不開口說話，成為了「啞巴」45年；山崎奶奶每年湊足了旅費就會到臺灣，只是為了確定前往南洋的愛人是否平安歸來；片山清子一輩子在追問為何母親要遺棄自己，期望與母親重逢；富永勝回鄉之旅卻成了告別之旅，四處搜尋兒時的好友，卻收到了一個又一個的死訊，但也有找到玩伴時的開心與激動。風間部五郎60年後與青年時代的戀人重聚；須田姊妹一輩子無法忘記在臺灣的快樂童年。還有一直在等待被選上擔任神風特攻隊的兒子最後家書的母親的故事……

《灣生回家》獲得臺灣第39屆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此書的確不是文學圖書，而可歸類為歷史或人類學的著作。雖然此書的缺點不少，例如描述灣生的故事時滲進太多作者個人的感情、對於灣生的生平發掘的深度不足，以及有些描述比較粗疏等。但作者所寫的「自序」和「前言」、鍾淑敏教授的「導讀」、老照片說故事、吉野村文史檔案等項目的目的，皆是盡量讓讀者更容易明白作者寫作此書的原因、什麼是灣生、以及灣生身處的地理和社會背景。而書末更附有參考書目和感謝名單，皆符合學術寫作的要求。

此書以22個灣生的感人故事，以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拆解我們習以為常的大歷史的觀念。作者以日本女性的角度來書寫，不是探求誰是侵略者的問題，也不是討論族群的關係、或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作者所展示的是一群在大時代的生命的悲傷故事，他/她們同是國家政策和戰爭中的受苦者。此書再次喚醒人們，在臺灣東部有一群被歷史遺忘的人群。相對於客家族群或原住民，日本移民的歷史較受研究者所忽略。最早探討日治時期日本移民歷史的學術研究發表於1986年（鍾淑敏，〈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史聯雜誌》，1986年，第8期，頁78-84），而到了2001年

才有第一本研究日本移民的專著（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官營移民為中心》，臺北：國史館，2001）。其後林玉茹出版《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相對於方興未艾的原住民和客家族群的研究，對臺灣日治時期日本移民的研究顯得十分薄弱。灣生的故事提醒我們，對於臺灣日治時期的歷史，原來有一大片被故意遺忘的空白。日本移民對於臺灣東部的歷史具有重大影響，他/她們所受的苦難不比別的族群為少，殖民者的景況並不一定是佔盡優勢和享受利益。這22個灣生的故事雖然是一些小人物的零碎片斷，田中實加在書中亦沒有提出什麼大理論，但是，此書的重要意義是讓我們重新反思地方社會研究的一些問題：我們在聆聽地方社會和族群的聲音時，我們的視野是否全面？我們是否須要放下一些既有的意見或論點？如果我們不是切切實實地走進地方社會，反思主流的意見和論述，不去發掘被邊緣化的聲音，我們的地方社會史是否只是「大歷史」的移植？

這些灣生公開承認被歧視的身份，所追求的不是殖民者的既得利益或地位，也不是要討回當日被沒收的財產，由於管理他們財產的臺灣日產公司倉促變賣了所有財產後宣佈結束，1970年代國民政府已表示無法處理任何索償（頁253）。這些灣生所追尋的，是兒時的回憶、對出生地的依戀，以及對這片土地的認同和被承認——出生戶籍謄本。在灣生的眼裡，有出生和死亡證明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更深層的意義是，他/她們是追求人生的意義、歷史的記憶。他們所追尋是與出生地的感情與歷史連繫。這些灣生熱愛出生的土地，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與其他族群相比不遑多讓。通過這22個灣生「有血有淚」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更深層次的地方社會的歷史。忽略這些「殖民者」的歷史，我們只會得到一個片面的社會圖像。這22位曾被邊緣化的人物的微弱聲音，讓地方社會的研究拼湊出相對多元與平衡的觀點。

在國家與重要政治人物的大歷史的權威話語下，地方社會的歷史、小人物的生命史往往受到壓制，就像《灣生回家》中的美紀奶奶一樣只好扮作啞巴。只有通過地方社會的角度，拼湊更多個人「活生生」的小歷史，我們才可以擺脫大歷史的干擾，建構更清晰的歷史圖像。當「千百個不同的小歷史匯聚起來，無可避免對大寫歷史製造衝擊」（曾嘉燕、吳俊雄編，《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香港：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8，頁4）。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